



从“平民文学”到“底层文学”的反思与追问

范家进, 金丽娜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五四时期周作人、胡适、鲁迅等人围绕“平民文学”各自提出了不同见解,周作人倡导“普遍与真挚”,胡适主张“田野的文学”,鲁迅则指出“平民文学”尚未存在,论争导致“平民文学”这一概念产生了较大的歧义。新世纪出现“底层文学”论争,其中关于概念界定、写作主体、底层经验等的论述,可以在鲁迅、周作人等人“平民文学”的理念中找到潜在关联。从文学的作者、受众和精神品质三个方面来考察新世纪“底层文学”乃至“网络文学”,新世纪文学必须有勇气正视这样的现实:真正的“平民时代”尚未到来。

关键词: 鲁迅;周作人;胡适;平民文学;底层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9)08-0398-08

Reflection and questioning from "civilian literature" to "lower-class literature"

FAN Jiajin, JIN Lina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Zhou Zuoren, Hu Shi, Lu Xun and others put forward different opinions on "civilian literature". Zhou Zuoren advocated "universality and sincerity"; Hu Shi advocated "field literature"; Lu Xun pointed out that "civilian literature" did not exist yet, and the controversy led to the great ambiguity for the concept of "civilian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there was a debate on "lower-class literature". About the discussion on concept definition, writing subject, and bottom-level experience, the potential connections could be found in the concept of "civilian literature" proposed by Lu Xun and Zhou Zuoren. "Lower-class literature" and "network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were investigated from three aspects: literature author, audience and spiritual quality. New century literature must have the courage to face up to such a reality: the real "civilian era" has not yet come.

Key words: Lu Xun; Zhou Zuoren; Hu Shi; civilian literature; lower-class literature

新世纪之初,“底层文学”作为一种创作潮流在文坛上颇为引人注目,众多学者参与与之相关的文学讨论中,包括“底层文学”的概念、创作主体、“底层文学”所继承的思想资源以及美学观念、道德倾向等众多议题。后随着相关争论的渐渐降温,面对“底层文学”存在概念分歧、对底层叙事真实性与艺术性的质疑、对其文学意义与社会意义失衡的反思等问题,有一些评论者重新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剖析了

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与偏离,给新世纪初这股影响颇大的文学创作潮流寻求思想文化资源,以图为之开辟新的文学生存空间。鉴于此,本文尝试根据20世纪20年代鲁迅等人对“平民文学”的阐述来观察并思考新世纪有关“底层文学”讨论中的一些问题,并简要反思鲁迅等人“平民文学”理念在考察当代文学发展中的有效性和生命力。

收稿日期:2019-01-17 网络出版日期:2019-04-10

作者简介:范家进(1963—),男,浙江开化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方面的研究。

一、五四时期关于“平民文学”的讨论

五四时期,在新文学阵营的内部,也曾一度出现过一场讨论“平民文学”的小小潮流,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郑伯奇、俞平伯等人都曾参与其中。各人对“平民文学”的概念的界定及具体的内涵外延,都各有自己的理解而很难达成一致。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与新世纪围绕“底层文学”的讨论有颇多相似之处。

首先是关于“平民文学”的概念。周作人认为“平民文学应该着重与贵族文学相反的地方,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1]5-6}而胡适认为“但司马迁、司马相如、枚乘一班人规定的只是那庙堂的文学与贵族的文学。庙堂的文学之外,还有田野的文学。”^[2]鲁迅则指出“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3]161}此处所引周作人、胡适、鲁迅三人关于“平民文学”的论述,足以可见他们对“平民文学”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就连周作人自己在《平民文学》的开篇也承认,“平民文学这四个字,字面上极易误会”^{[1]4}。可以这么说,周作人、鲁迅、胡适等人是在各自不同的概念界定下进行的论争,导致这种论争在某种意义上难以成立,三家各抒己见,最后却发现他们讨论的对象并不是同一个东西,整一场有关“平民文学”的讨论实质上是一场错位的论争,下文将具体分析。

(一)周作人:普遍与真挚

“平民文学”首倡者非周作人莫属。早在1918年12月,周作人写成《平民文学》一文,指出“平民文学”是与“贵族文学”相反的文学。无论是“贵族文学”还是“平民文学”,在作者方面、写作对象方面、受众方面都是不拘泥于字面的,“平民文学”并非只能是由平民自己创作的、专讲平民的生活、专门做给平民读者看的文学,它与“贵族文学”区别的关键在于文学的精神,即“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周作人认为,“贵族文学”是“大抵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而与之相对的“平民文学”则应该是内容充实的,也就是普遍与真挚的^{[1]5-6}。不应该写只占人口少数的英雄豪杰才子佳人,而应该写更为切己的世间普通男女;不应该只写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而应该写人间交互的实行道德;不应该只追求文辞雕琢、以美为主,而应该表达真情实感,“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同时他还指出,“平民文学”虽

比古文更为通俗,但它决不单是通俗文学,不必做到让田夫野老都能理解,“平民文学”也绝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伪善的慈善主义包裹着傲慢与私利,与他所倡“平民文学”的精神无法相容。^{[1]4-8}在该文中,周作人将其所倡导的“平民文学”纳入五四时期“为人生”文学的时代主潮,又特别强调文学应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能承载普通男女的生活和精神,能表达普通大众的所思所想所喜所爱,不事雕琢而淳朴自然,即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努力做到“普遍与真挚”。

周作人的“平民文学”理念在此显示出他的独特性。在他看来,“平民文学”的作者、读者、描写对象并非必须为平民,言外之意是包括周作人自身在内的知识分子阶层都可以是“平民文学”的创作者及表现对象,乃至贵族生活也可以成为写作的题材,贵族本身也可以是这种文学的表现对象或阅读受众之一。换句话说,“平民”不是“平民文学”的关键,在整个创作与接受的过程中,“平民”群体是可以缺席的。作家创作一种与先前“贵族文学”相对的非部分、非修饰、非享乐、非游戏的文学,并命名为“平民文学”,可这种文学的核心却不在“平民”本身,而关键核心恰恰在于创作的主体——包括以周作为代表的启蒙知识分子——是否具有“平民精神”,是否通过作品传达了他们这种在此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曾出现过的现代“平民精神”。这其中不免透露着周作人作为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新文学倡导者的某种知识和道德优越感。他们站在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汇处,倡导一种理想形态的“平民文学”,敢于自作主张自标新帜,这确实需要一点前无古人的勇气。

(二)胡适:田野的文学

同样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对“平民文学”与周作人的理解迥然不同。胡适的“平民文学”概念注重与传统和民间的联系,基本上等同于源自民间的文学。如果说周作人“平民文学”的核心在于创作主体的“平民精神”,那么胡适“平民文学”的核心则在于文学作品的“民间性”。两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平民文学”的作者、读者以及内容。在周作人那里缺席的平民,在胡适这里成为了主角。胡适认为,“平民文学”的作者和读者(或许可以称为听者)就是来自民间的平民百姓,他们大都不识字;内容上则是反映民间生活,表现民众的生活现实和思想感情;另外在形式上,大多采用民间的形式,包括民歌、儿歌、故事等平民百姓能快速接受的形式,具有极强的民间性和极广的传播空间。胡适认为,司马迁、司马相如、枚乘一班人是庙堂文学和贵族文学

的代表,而另外一些“平民文学”则是“那无数小百姓的代表”,是“庙堂的文学”之外的“田野的文学”^[2]。

表面上看,胡适的“平民文学”观弥补了周作人“平民文学”观中平民缺席的不足,将平民群体置于“平民文学”创作与接受过程的关键地位,启蒙知识分子则暂时退出现场,不直接涉入此种文学的良性发展。但进一步思考推敲,胡适这种“民间主义”的“平民文学”观念也存在明显的漏洞。

第一,平民在场并不等于平民成功发声。按照胡适的思路,百姓创作和传播(传唱)的作品,反映的就是百姓的生活和精神,表达的也是百姓的心声与愿景,但其实不然。很多时候,出于当权者的政治文化高压,或者受上层文化文学及乡绅趣味等的影响,平民百姓在创作山歌民歌的时候不免会有各种不纯粹的因素混杂其中,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平民文学”也在人生理想、构思取意及表现手法上袭取统治阶层的思路和格调。正如鲁迅所言:

“……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现在也有人写下来,以为是平民之音了,因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们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不能称是真正的平民文学。”^{[3]161}

第二,胡适理解的“民间文学”易于稀释“平民文学”。胡适从温和的改良主义视角出发,将白话文和中国古典文学的脉络打通,试图从“古已有之”的传统古典文学中为新文学寻找资源,这无疑是一种有价值的思路。但是在五四新文化大背景之下,若将“平民文学”置换为“民间文学”,这无疑消解了“平民文学”一词所蕴含的时代性与革命性。新文化运动将民主与科学之风吹进了腐朽的中国大地,进化论思想传入中国,“平民”一词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革命意义,而用“民间”范畴来为“平民”作注脚,无疑是稀释了“平民文学”在那个年代所具有的现代性意义,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平民的出场一方面弥补了周作人“平民文学”主张中平民缺席的不足,但从时代意义上看,胡适侧重“民间性”的平民文学观念更多地偏向于形式,从而在思想境界与深度方面与周作人关注“平民精神”的主张相去甚远。武斌斌^[4]指出,胡适对平民文学概念的理解主要是为了寻求他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合理性。但民间文化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其戏谑、反抗也并不具有时代特征,它所承载的“伪道德”更是周氏坚决反抗和抵制的。

(三)鲁迅: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

面对人言人殊的“平民文学”,鲁迅在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校发表著名演讲《革命时优的文学》,立场鲜明地提出了他有关于“平民文学”的理念。鲁迅清晰地给自己所处时代定位,认为“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因为“工人农民还没有解放”^{[3]160}。在鲁迅看来,工人农民一天不解放,这世界上就一天没有真正的“平民文学”,“平民文学”的诞生是与工人农民阶级的解放息息相关的。鲁迅对周作人那种顾影自怜式的书斋里的“平民文学”显然不表认同,也对胡适那种将古典文学中的民间文学等同于“平民文学”的乐观思路不以为然。他站在中国社会、文化、文学大转型的特殊时代语境中,为“平民文学”的概念注入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和创造意味,这一概念自此鲜明地打上了思想家鲁迅的独创意味和特有风格标签。

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指出:

“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

……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眼前的文人有些虽然穷,但总比工人农民富足些,这才能有钱去读书,才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说的,其实不是;这不是真的平民小说。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不能称是真正的平民文学。……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有些人说:“中国已有平民文学”,其实这是不对的。”^{[3]160-161}

鲁迅认为现在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做给上等人看的,就算是以平民为创作材料的作品,它们也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另外,如前文所述,鲁迅指出由平民创作和传播(传唱)的山野歌曲等,其实也并非真正的“平民文学”,因为老百姓受古书和乡绅的影响很大。鲁迅否认“平民文学”已经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人农民还没有解放,他们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3]161},换言之,鲁迅所理解的“平民文学”,乃是由解放了的工人农民创作的、反映工人农民思想的文学。鲁迅这篇在黄埔

军校的演讲,以前被引用得最多的无疑是其中一句比喻性的说法:“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3]162}。

对鲁迅关于革命不同时期文学的不同处境和形态的高屋建瓴的洞察和预见,批评界总免不了有意无意地加以轻忽。它蕴藏的信息量其实非常丰富。就本文话题而言,鲁迅是对同时代一些文化人关于“平民文学”的种种议论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回应,表达方式不是批驳他并不认同的他人论说,而是干净利落落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彻底否认中国乃至全世界已存在真正“平民文学”的说法——“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3]160}。

除了对中国和世界文学现状这一显然与周作人、胡适都迥然有异的判断,在该演讲中,鲁迅还根据自己对中外文学发展历史和掌故的熟稔,简明扼要地区分了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可能出现的文学的不同性质、特点和发展形态。也即革命前的“呜不平文学”“怒吼文学”,革命过程中的“文学沉寂”“没有声音”以及革命后的“讴歌文学”“挽歌文学”,“再往后去”则是“平民文学”^{[3]157-160}。考之鲁迅演讲后的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他的观察和预言基本上可以得到历史的证实,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分别能找到与鲁迅命名相对应或大致相符的发展阶段。只是他演讲时关于“再往后去”的对“平民文学”的期待和预测,与实际发生的文学情状之间,显然还存在着不小的距离。按照鲁迅的思路来考察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这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也是一项需要更多投入的学术任务。本文暂无暇于此,而只是将眼光跳到新世纪初一场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上,看看它在概念的提出、论题的展开及探讨的面向和深度等方面,跟鲁迅当年的思考与预测之间,是否可以做点跨世纪的分析与比较,以便为考察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现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与思路。

二、新世纪初关于“底层文学”的论争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时期文学”总体说来多姿多彩,富有活力,且伴随一些虽未充分展开却也具有一定热度的话题争论。1990年代开始酝酿、到了新世纪初的一些年份一度蔚为大观的“底层文学”思潮,也可视为这种活力的表现。它跟多数“新时期文学”话题一样,忽然一度备受关注,引起了大范围的讨论,一时间歧义纷呈。各家莫衷一是,未能出现高屋建瓴、海纳百川的理论概括或是足以显示这一旗号创作实绩的富有影响力的大作家,故而也免不了很快偃旗息鼓的命运。本文自然也无意系统考察

这一文学现象的起与落、兴与衰,也无暇展开对一些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分析,而是主要针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代表性论点,简略考察一下它们的理论资源、思考方向、话题展开方式、各自使用此一概念时在内涵与外延上的歧异,以及话语背后的思想文化诉求,等等。当然本文也试图借此观察一下这些议论与1920年代鲁迅的“平民文学”表述与设想之间,是否可以寻找到某些理论关联,两者之间是否也能达成一次相距80来年的间接的隔空对话。

(一)“底层文学”的论争内容

跟“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多数论争一样,关于“底层写作”的讨论也显得凌乱和含混,而且免不了自说自话,并没能经过一定的讨论形成一种被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广泛认可的共识^[5]。所以如果用一种严格的标准来衡量,很难说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潮”,充其量也只是具备了某些“思潮”的外观或样态而已。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归纳。

第一,有关“底层文学”的概念界定。同五四时期“平民文学”一样,“底层文学”也因“底层”一词的复杂内涵和宽泛外延而难以赋予其某种单一的意义,什么是“底层”?“底层”的范围在哪里?哪些文学作品可以被定义或归入“底层文学”?对于这些问题,众多评论家各执一词,终未能就“底层文学”的概念问题达成一种共识。

国内文学评论界最早究竟何人使用这一概念似乎尚无定论,郭文元在《周作人“平民”文学精神与新世纪“底层文学”论争》一文中指出,“多数评论者是从社会学属性来界定‘底层’的,甚至有人把‘底层’具体窄化为‘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6]人是社会中的人,应该从社会属性的角度来关注和书写“底层”,而从这一维度出发,其关注焦点便自觉地集中到了“底层”在物质层面的压抑与困境。但同时他也指出,“但文学……仅仅停留于对主人公物质权利境况的关注,有可能带来对‘底层’所受精神困境的忽略和遮蔽。”^[6]事实确实如此,物质生存水平不能等同于精神境况,贫穷不能用作“底层”的代名词。换句话说,“底层”的现实境遇中不单单只有“贫穷”一个关键词,仅用它来叙述“底层”未免显得以偏概全。文学的任务除了揭示物质生存现状之外,更要关注在此种现实困境之下的精神困境,以期寻找摆脱这双重困境的方式与途径,这才是“底层文学”应有的品格与韧性。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底层人民”面临的物质困境或生存苦难不值得作家去书写,也不是说物质贫困和精神贫瘠之间互不相干,恰恰相反,人的

精神空间不是空中楼阁,而是需要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做基础支撑(除非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已经特别独立而发达,那又另当别论)。因此,我们所期待的“底层文学”,应该是能够正视与发现这种“双重贫困”并且予以准确描绘的。

第二,有关“底层文学”创作主体的界定。这一问题实质上是在确认“底层文学”的书写权。由谁来书写“底层”?怎样的作家可以被划归为“底层作家”?是精英知识分子代替“底层”发声,还是由“底层”自己发言?如果是由“底层”自己发言,那么当该作家作为“底层代表”发言的时候,他的“底层”身份是否又有了某种程度的转变,他是否还属于纯粹的“底层”?若不是,那么所谓的“底层文学”是否就陷入了一个充满悖论的怪圈?

围绕这些问题,评论界有过不小的争论,有些论者认为“底层文学”由知识分子代“底层”发声无可厚非,且应该由掌握学识的知识分子来为之“代言”。之所以被称为“底层”,是因为这一阶层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最低端,往往没有足够的书写能力来表达自己,从而沦为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日常谋生方式是从事物质生产或服务,虽然识字能力已普遍提高但还不能够准确而完整地表达自己。作为一个阶层,他们需要有“底层关怀”的知识分子来为其代言,代他们发出心声和诉求。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分论者的观点与上世纪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平民文学”理念相近,有良知的作家秉持着“平民精神”创作,写“平民”之不能写,说“平民”之无力说。

也有另一部分批评家认为“底层文学”不该由知识分子横插一脚,“底层文学”就该由“底层”自己来做。他们的理由是,知识分子没有“底层生活”经验,他们看到的“底层”必然有限,因而对“底层”的叙述终不免成为一种“脑补式”的虚构,对“底层”的认识大多只能停留在表面,而不能拨开诸如“贫穷”、“愚昧”、“粗俗”此类外在标签或既有惯性认知,单刀直入地深刻剖析“底层”人民的真正精神困境或精神创伤。“前者‘代言’出的世界只能是‘代言者’想象出的‘底层’世界,其与真正的‘底层’世界是相‘隔’的……”^[6]但这一部分论者所面临的尴尬正如上文所说,当某个“底层民众”作为“底层代表”面对公众发言的时候,他/她往往已被冠上“作家”的名义,而在人们的主流认知概念中,一旦跻身于“作家”行列,即刻与“底层”相距甚远。在创作主体这个问题上,“底层文学”掉进了难以自圆其说的陷阱。郭文元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即使是‘底层’出身的打工作

家,也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自己所属的阶层。”^[6]。这正印证了上面所述的“底层”身份的悖论。张光芒在他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底层”身份的荒谬之处,他认为“‘底层’其实就是一个大分母,许多人自以为是已经跻身于更高层级的‘分子’,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幻像。”^[7]

(二)“底层文学”的悖论

“底层文学”概念确实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针对这一悖论,王晓华提出“作为公民的写作”^[8]这一概念,目的是能够弥合“作家”与“底层”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与鸿沟,即在讨论“底层文学”与“底层作家”之前,先人为地预设一种“众生平等”的大背景。“作为公民的写作”消除了“叙述者”与“被叙述对象”之间的不平等性,从“被叙述者”转变为“叙述者”的过程中,其身份并未发生改变,自始至终都是“公民”,因而“身份认定”这一难题将不复存在。可以说“公民”概念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但是它又带来了另一些棘手的问题——如何界定“叙述者”和“被叙述者”?“被叙述者”都能转变为“叙述者”吗?倘若能够,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在完成转变的过程中,“叙述者”的精神状态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先看前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被叙述者”,“底层文学”中的“被叙述者”到底是什么?一般都可以想当然地回答:“底层文学”的“被叙述者”自然是“底层”,是“底层”的人与事。但正如前文所述,究竟何为“底层”,“底层”究竟有怎样的内涵与外延,并不是没有争议的。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所预见的“平民文学”的创作者和创作对象,确实是“解放了的工人和农民”^{[3]161}。但近百年过去,当“平民文学”逻辑上的隔代继承者“底层文学”登上文坛的时候,人们却无法给鲁迅一个想象性的明确回复,这些写作者和表现对象究竟是否就是当年鲁迅所期待的“解放了的工人和农民”。简单地回答“是”或“不是”,都很难跟鲁迅当年的演讲构成有效的对话。

再看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看待从“被叙述者”转变为“叙述者”这一过程中人精神状态的变化。“公民”强调的是抽象意义上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平等,但任何社会都无法实现各式公民之间在物质生活层面的平等,也无法实现公民在知识、精神、信仰、价值观等层面的整齐划一,甚至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个人心理价值层面的多元多向局面就更为显著。这样一来,“作为公民的写作”也只能在抽象的理论意义上强调“众生平等”,实际上同样无法弥

合各式各样的“公民”在物质和精神世界上的极大落差。而“被叙述者”一旦得以跻身于“叙述者”行列，其外在生活方式及内在精神心理方面的诸多变异和转移，都是不言自明的。简言之，今天这个“公民”早已不是昔日的那个作为“被叙述者”的公民了。

另外值得追问的一个问题是，“作为公民的写作”消除了“底层”与“上层”这两个词汇，“公民文学”取代“底层文学”，“底层文学”也就不复存在，那么试问我们现在讨论的还是“底层文学”吗，是否还有讨论的必要？如果连讨论对象都丧失了，讨论本身就失去了价值意义。因此在笔者看来，用“作为公民的写作”来阐释或者说取代“底层文学”是颇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性与五四时期胡适混淆“民间文学”与“平民文学”两个概念有类似的偏颇之处。

三、“平民文学”的时代离我们还有多远？

一个是“平民文学”的命名与展望，一个是“底层写作”的讨论；一个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诞生期的1920年代，一个发生在新世纪初年。尽管两次不同形式和热度的讨论之间相隔了80多年，两个时代之间的具体语境以及参与者之间也存在天悬地隔，可它们还是可以引发人们对于文学史上这些同类或相似概念或范畴的对比和思考，并借此窥探文学史的某种发展路径和曲折而又艰难的演进轨迹。不妨首先从文学的作者、受众和精神品质方面做些比较分析，然后简略打量一下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

（一）文学的作者问题

按鲁迅的理解，是否平民自己来“开口”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在鲁迅生活的年代，有能力自己来“开口”或写文章的毫无疑问是“总比农民富裕”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职业写作者。以“修辞立其诚”、文学忠于自我的要求来看，作家或知识分子对其他阶层人物的描写不太可能完全摆脱居高临下、悲悯同情的姿态，“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之间难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即便是鲁迅，对于笔下的农民也只能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存在着“双向隔膜”的现象^[9]。茅盾写农民、老舍写北平市民、巴金写旧家族中的仆女丫鬟，也基本上只能采取这样的现代启蒙者姿态和笔墨。要他们彻底置身真正的平民中间，完全感同身受，这是脱离文学史发展实际的高蹈的要求。而事实上在中外文学史发展过程中，都曾出现一批从统治阶层叛逆出来的为平民说话代言的“忏悔的贵族”。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

众接受教育的程度得到了普遍提升，大众的书写能力普遍有所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它也为鲁迅当年所展望的“平民文学”书写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但一般的应用性书写与文学书写或文学创作之间，显然存在着不小的距离。所谓“诗有别裁”，“文学”书写有其独特性，它在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更丰富细腻的情感、更敏锐独特的生活发现能力以及更高超的文本形式创造能力，这些都并不是只要受过基本教育的人都能具备的。从理论上说，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大家理应是长期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和工人、或者别的具有丰富“底层经验”的各类人士。但这些人群中具有较高文学书写能力的人所占比例不会很高，甚至一旦具备了这种能力而且通过写作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誉后，也往往很快不再继续在底层求生存。因此，倘若说“平民文学”或“底层写作”一定只能由平民或底层人物自身来从事并且作为其中的主体力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只能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事实上，有过或长或短的底层经历、或是建立在一定时期底层观察体验基础上的写作，甚至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底层调查报告等，都应该可以归入广义的“底层写作”。换言之，以较高行业标准为前提的“代言式写作”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补充。当然，依旧置身底层的人们能尽可能多地自己开口、自己说话，无疑是越多越好。它自然也需要别的外部条件与其配套，譬如发表空间等方面。

（二）文学的受众问题

五四新文学的精英性和先锋性已被学界公认。鲁迅的母亲就从来不会阅读鲁迅本人创作的白话小说，鲁迅为她老人家购买邮寄的是张恨水等人的通俗小说。赵树理在1930年代开始自己的文学训练时，发现新文学根本进不了农村识字人的视野，所以他称新文学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是仅能用于文人之间相互交换阅读的“交换文学”。更多的新文学工作者在抗战当中有缘进入乡村社会时，终于发现农村所流行的仍然是各式各样的传统读物。所以，即便是新文学倡导者主观意愿上竭力要为工农大众写作，普遍不识字的工农大众也无缘接触新文学作品，更不用谈熟悉、亲近或喜欢。伴随着政治革命而展开的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工农兵文艺活动，在某个层面上试图面对或解决这个问题，但它们与鲁迅、周作人所倡导的“平民文学”之间所存在的落差和歧异不可以以道里计。那么，新世纪初“底层文学”的读者是否大有改观呢？是否符合鲁迅等人当年的期待呢？情况其实也不容乐观。工农阶层及其子女识字

率的普通提高是毋庸置疑的,但具备阅读能力以后未必就是文学的热心读者,在诸多可供选择的各式读物当中(当然包括很多实用性读物和非虚构类读物),“平民”或“底层”身份的读者有太多的理由去选择非文学类读物。更何况随着电子科技的发达,影视作品、电子游戏、智能手机上应有尽有的各式娱乐消遣产品,都远比一般文学作品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且对大众的进入门槛显然都更低更简易轻松。进而言之,平民在物质生活水平和识字率都普遍提高以后,还拥有旅游、购物、健身、电竞等林林总总的似乎更有趣也更轻松便捷的打发工余时间的选项。这么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平民读者关心和阅读表现平民生活的文学作品,这一美好想象也终将属于某个时代文人雅士的一厢情愿?但同时也还必须承认,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一定比例的文字文学产品爱好者总还是存在的。

(三)文学的精神品质问题

周作人认为“贵族文学”是“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他提倡与之相对的内容充实的“平民文学”,强调作家要带着“平民精神”来创作“普遍与真挚”的文学^{[10]5}。“平民文学”的作者与受众都不限于“平民”,而是包括“贵族”在内的所有人。他在另一篇文章《人的文学》中说过,他信奉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文学^{[10]13},其中蕴含着他对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立性与主体性的特有尊重。“力求文学启蒙的同时保存个人发展的个性,在两者间找到一个平衡的位置。从这方面来说,‘人的文学’观念成为提倡普遍与真挚的‘平民文学’的思想基础。”“周作人所提倡的‘平民文学’就是‘人的文学’”^[11],其“平民文学”观念是超越阶级的、一种广义的“人类爱”。在鲁迅那里,“平民文学”则是由彻底解放了的工人农民阶级创作的、表达他们自身思想的文学^{[3]161}。这里的“工人农民彻底解放”,指的就是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不再受到任何压迫与剥削,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解放”指的是工农的解放,而非工农阶级斗争胜利以后重新建立新的政权,开启新一轮阶级斗争。如此看来,虽然鲁迅与周作人所提倡的“平民文学”有各自的关注点,但他们的文学理想还是存在着相当多的共同点,即关注“人”本身,不但关注“人”所处的具体生存环境,也关心“人”在精神上的健全与平等。而浏览新世纪有关“底层文学”的论争,大多围绕“底层”的概念界定、创作主体能否代言、“底层作家”身份可信度等问题,涉及的范畴基本上停留于外在层面,而关于这类写作

的内在精神品格与艺术品格等内部问题的探讨却相当不足。不得不说,新世纪这场有关“底层文学”的讨论在思想深度和知识眼界上比起当年“平民文学”论争是有很多欠缺的。关于它的一些讨论很快偃旗息鼓而难以持续深入,看来不是没有原因的。

(四)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可否视为“平民文学”的一种替代品?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网络的日趋普及,一种全新的小说创作模式和形态也应运而生,那就是“网络文学”。世界的发展总是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料的现象。这样一种完全出乎五四先贤们的想象的、全新形式的网络文学,是否也可以借助“平民文学”的理念来审视一番呢?因为至少它在形式上具备了“平民写”、“平民看”的可喜外观,理论上具备了全民皆可创作的属性。作为一个全新的事物,这里仅仅把它作为一个话题提出来加以简单讨论。

网络文学,顾名思义,就是网络作家(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网络写手)以网络为创作平台而发表的作品。相较于传统的纸质文学,网络文学具有创作量大、传播速度快、阅读门槛低等特点。具体地说,网络文学可以拆分为网络和文学两个组成部分,一方面网络是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另一方面文学又是它应有的客观属性。网络的容量巨大,藏污纳垢的能力也很惊人。当文学与如此庞大的网络容量相结合,就注定了网络文学从一开始就需要背负着文学以外的重任——诸如商业淘金、舆论造势、娱乐炒作等等,它们当然偏离“文学”本身的传统功能。从1998年痞子蔡发表网络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引起关注至今,网络文学具有居高不下的创作量,它也从最初自成一格的行文模式发展至今天“娱乐至上”的创作观、消费观。网络文学的质量远远跟不上其创作的数量,文学的精神日渐丧失乃至消亡,大尺度不健康的肉欲书写及其他低俗情调和趣味溢满屏幕,“快餐式消费”催生了“快餐式文学”。网络小说在“娱乐至死”的时代语境下,难以逃脱泛娱乐化、泛商业化的宿命。

毫无疑问,网络文学革新了作家(文字工作者)的创作方式,也改变了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传统习惯(一种自古相传的案头独自静读的方式)。网络的开放性与大众性催生了众多的写作者,鼓舞着更多有着表达欲望的人们参与到“全民写作”中来。与传统的严肃文学相比,网络文学似乎是一条通往“平民文学”的捷径。网络作家通过网络与读者见面,这就意味着任何人只要有一台联网的电脑(甚至一部入

网的移动手机)就可以成为网络写作者,这种全民平等参与、自由创作、开放评论的氛围是传统文学所难以企及的。这是否意味着“网络文学”的诞生使人们提前进入了“平民文学”时代了呢?——在笔者看来显然不是。创作与阅读传播的自由开放性并不意味着文学的进步,相反,网络文学在某些方面可能成为遏制文学进步的绊脚石,因为它们流品不一、泥沙俱下,其中相当大比例的作品已基本上无文学精神可言。按照周作人“平民文学”思路,只有那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秉承“平民精神”创作的“为人生”的文学才称得上是“平民文学”,它必须是反映最普遍男女的生活,表达最真挚的思想情感的文字。反观眼下海量的网络文学,在“平民写”的道路上越走越偏,非但没有走到“写平民”,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书写达官贵胄、霸道总裁、皇亲国戚等等“部分的”人的生活。现在的网络文学也很少敢于直面现实,反而大多具有越来越强的虚构性和幻想性。这么一种书写路径,难道不是重蹈当年周作人所批判的“贵族文学”、“才子佳人小说”的覆辙?看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轮回,某些网络文学的写作又重新堕入周作人所厌弃的“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泥淖中去了。

面对这种崭新的文学形式,传统文学批评总体上还处于失语状态,一时难以给予准确而清晰的定位和描述。但既然冠之以“文学”,就算是将它纳入了文学的大花园,那自然就不能片面强调其技术性而丢失文学本质。网络文学的个性娱乐风习,显然浸淫着“娱乐至死”的后现代文化风尚,沾染着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种种弊端。而事实上,文学恰恰只有与时代风尚自觉拉开一定的距离,至死不渝地坚持着开掘和反省个体精神与时代精神,孜孜不倦地从事“对存在的勘探”^[12],才能在日趋物化的时代里取得继续生存和生长的合法性。在此意义上,网络文学也亟需经由鲁迅“平民文学”理念的洗礼,将真正解放的、现代的平民思想融注其中,从而切实提升其应有的精神品位和艺术品格。

四、结 语

从五四时期到新世纪,从“平民文学”到“底层文学”,从鸳鸯蝴蝶派的新才子佳人小说到网络文学,新文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回环往复”的发展迹象。但当人们沉入到两场争论的底部,却无奈地发现这种“回环往复”不一定是上升的、前进的,当代评论界对“底层文学”的讨论与当年

周作人、鲁迅等人达到的高度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小的距离。评论界热衷于对概念等外部问题的争论,因过分关注“底层文学”的社会属性而作茧自缚,将精神世界这一亟待开辟、深入的领域悬置一边或浅尝辄止,始终未能正中“底层文学”的靶心。而真正触及“底层”民众灵魂的文学,应该是当年鲁迅、周作人等人倡导的“平民文学”精神的延伸,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作家应该以积极的姿态去书写被书写者所处的真实处境,在叩问自己内心的同时完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审视。同时,评论家也有责任积极促成“底层文学”向良性方向发展,积极呼吁向真正的精神、艺术高塔攀爬,警示作家们突破“比苦比穷比惨”的底层叙事固化模式。我们当然有理由对“底层文学”抱持一种不无乐观的期待。不过对于文学发展的现状,如果不时回顾鲁迅、周作人等人近一个世纪前关于“平民文学”的讨论和期望,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这样的现实:真正的“平民文学”时代尚未到来。

参考文献:

- [1] 周作人.平民的文学[M]//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4-8.
- [2] 胡适.国语文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8.
- [3]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M]//鲁迅.鲁迅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55-163.
- [4] 武斌斌.平民文学:概念的歧义与发展[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3):79-83.
- [5] 范家进.底层叙事:文学界的一场话语自救运动[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2(6):47-55.
- [6] 郭文元.周作人“平民”文学精神与新世纪“底层文学”论争[J].当代文坛,2012(1):120-123.
- [7] 张光芒.是“底层的人”,还是“人在底层”:新世纪文学“底层叙事”的问题反思与价值重构[J].学术界,2018(8):43-57.
- [8] 王晓华.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之争说起[J].文艺争鸣,2006(4):34-38.
- [9] 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2:84-85.
- [10] 周作人.人的文学[M]//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3.
- [11] 廖宁.“五四”时期“平民文学”的诉求与差异:以周作人为中心[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5):88-92.
- [12]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孟湄,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3.

(责任编辑:陈丽琼)